

智利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 陈秀红

经济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经济模式。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又恰好赶上20世纪80—90年代末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顺势实现了经济腾飞。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智利主动推动经济由“内向发展”向“外向发展”转变，建立了多元开放的对外贸易格局。近30年来，不同于拉美许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向型发展模式，智利坚持开放理念，拓展多元化对外贸易关系，利用与亚洲隔海相望的地理区位，实施向亚太地区倾斜的经贸政策，尤其注重深化与中国关系，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的当今世界，智利这种外向型偏好顺应了国际经贸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同时，智利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重点从税收、投资体制和养老基金三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领域的改革，对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强资本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持续推进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实施强有力的财政调控政策，积极规避“资源诅咒”

资源充裕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而遭受“资源诅咒”。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生产国，其出口占世界铜矿总出口的43%。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拉美国家为缓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本国经济影响，建立稳定基金，21世纪后又建立了基于本国自然资源收益的主权财富基金。但要实现基金长期积累，离不开一个能够顶住各方压力的强力政府，严格按照规定确保资源收益及时存入基金。相较智利而言，拉美各国政府普遍缺乏保障财富持续累积的调控能力，导致国家逆周期性制度安排名存实亡。智利政府严格实施结构性平衡的财政规则，通过谨慎的“减震型”财政政策实施有效调控，按照预算盈余目标，在矿产价格升高时，将额外收入纳入稳定基金，在价格低迷时则能保证政府的正常支出。这种做法能够将周期性经济波动下的财政支出水平与铜价波动的负面溢出隔离开来，并且对基金实施透明化管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避免各方利益冲突和政府寻租腐败问题。谨慎而连续的财政政策，使政府有相对稳定的财政盈余与财富积累，能够有财力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引导产业多元化发展。相关数据显示，近20年中，智利在对外贸易出口中，制造业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呈现增加趋势，出口农产品也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

推进平稳有序的政治转型，形成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

受20世纪70年代末拉美地区整体环境的影响，智利国内也开始了反对军政府的呼声，加之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促使智利开始推进政治转型。智利政治转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83—1990年，军事威权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实现有限民主；二是1990—2005年，各届文人政府逐步消除军队自主权，2005年实施宪法改革，政治转型基本完成。总的来说，智利政治转型的进程较为平稳，政府更迭有序，其最突出特点是每个新政府都没有改变已经确定的经济改革方向，各项经济制度都获得了较好的延续，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动荡，各项社会治安指标在拉美国家也排在前列，有效防止了其他拉美国家转型中普遍存在的“钟摆现象”，即经济政治状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智利的政党联盟策略，它成为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性因素。军事政变前，智利政党政治呈现出“极化”特征，政府左中右三方势力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自1990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以来，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各政党间意识形态差别缩小，并采取广泛合作的策略。在智利两大政党联盟的作用下，各政党都力争中间选民支持，结果就是不同利益群体都被纳入到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联盟中，不同利益诉求在联

盟中相互交织、妥协、协调，有助于达成一致意见。更为难得的是，各执政联盟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实行前后基本趋同的政策，保持了前后政策的连贯性，使政府得以有效运行，最终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注重推动民生领域改革，构筑社会安全网

很多拉美国家在疾风骤雨般地推行效率为先的市场经济时，往往忽视社会公平，使许多改革措施因缺乏广泛支持而夭折，甚至导致政权更迭频繁，最终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泥潭。而智利在推行市场经济后，开始逐步注重公平，把推进社会公平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由于1973—1990年军政府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念，引发了严重的贫困、失业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于是，1990年后的文人政府开始注重推进民生领域的社会政策改革。例如，1990—1993年的艾尔文政府提出“增长而兼顾公平”的口号，提高社会性支出以增加社会服务和改善收入分配，并且将社会支出的重点放在最贫困阶层，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最低收入阶层的补助以及改善基础教育。建立社会投资基金，用以扶贫开发项目。1994—1999年弗雷总统强调要优先解决贫困问题，提出“坚持增长，消灭贫困，实现名副其实的公正”。2000年拉戈斯政府提出要让智利人更“有尊严”地生活，强调构筑社会安全网，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实施“智利团结计划”，发动社会志愿力量参与扶贫行动。除了重点解决贫困问题外，智利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表现为：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公立与私营医疗机构共担医疗服务的混合医疗卫生制度、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雇主负责的工伤保险制度以及一套独立完整的社会救助制度。智利在民生领域的社会改革，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为经济发展构筑起了一张广泛覆盖的社会安全网。

智利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成功转型是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证。但从长远来看，智利改革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很难获得持续性发展，甚至有可能会重新跌落到“陷阱”里。2019年因为首都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引发的暴力冲突，就给智利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智利模式”的反思。目前，智利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隐藏在人均GDP面纱下的“贫富分化陷阱”。2007年智利最富有的前5%家庭占有了58%的国民财产，2017年虽有所下降，但比例仍高达50%，而且贫富分化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政策领域的福利分化。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智利在养老、医疗、教育等主要民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推行私有化，强调个人责任，使得本应突出公平民生领域转而追求效率，导致更多更优质的福利资源流向富人阶层，形成了社会政策的“逆向”分配效应。2019年暴力冲突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心存怨气，公平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怨气转化为戾气，最终引发暴力冲突。另外，从经济层面看，智利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且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比较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数据显示，2019年智利国际竞争力排名比2018年下降7位，是下滑幅度最大的国家，这说明未来智利发展可能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因此，如果智利想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继续深化公平取向的社会政策改革，继续引导产业结构多元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西班牙的社工培养体系

□ 于虹丽

西班牙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指受雇于政府或民间福利机构，从事社会救助、社会慈善、残障康复、司法矫正、促进教育文化等社会慈善服务行业的社会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和义工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得到所雇单位给予的一定报酬，其服务也更为专业和系统化。西班牙社工教育在这种专业而系统化的服务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社会工作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对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正义有重要意义。

发展历程

在西班牙，社会工作既是一个职业，同时也是一门学科。起初，社会工作仅被视为一种职业，伴随着西班牙社工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这一职业逐渐走向专业化。可以说，西班牙社工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进程是相伴而行的。

西班牙社工教育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特点是西班牙社工教育在本国的发展。始建于1932年的社会工作学院，为西班牙培养了第一批专业社工。1934年，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统治下的政治动荡时期，巴塞罗那地区率先出现了社工这一职业。1966年，西班牙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总局培训科通过了社会工作学院中关于社工专业的课程内容、人员数量、学习规划和考试方式等具体规划，这使得社工教育的内容更加科学，结构更加合理，形式更加规范。1975年，在西班牙大学中开始了关于社会工作的相关学术研究。随着社会工作不断规范化，1982年，学术研究工作也达到了顶峰。研究认为，作为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应该有专业的干预方式，有管理个人和集体用户的权力与能力，同时应有助于提升不同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下的社会福利。因此，一方面，这些研究工作对于塑造更加专业的社工，并最终成为合格的社会工作者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工作为康普顿斯大学社会救助学院成立提供了巨

大的推动力，此后，社会救助学院正式更名为社会工作学院，成为康普顿斯大学6个著名的大学专业学院之一。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西班牙社工教育融入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在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下，博洛尼亚进程应运而生，1999年6月，29个欧洲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签署《博洛尼亚宣言》，该宣言是一场以区域合作形式引导各参与国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运动。作为签署国之一，西班牙社工教育与欧洲各国的社工教育进入了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发展时期。欧洲各国之间的社工学历可以相互承认，社工人才就业可以相互交流，这种合作为培养复合型 and 跨国型社工人才开创了新的教育模式。在西班牙社工教育融入欧洲社工教育的过程中，西班牙社会工作教育为欧洲社工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欧洲其他国家的社工教育经验也对整个西班牙语系国家的社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课程设置

目前，西班牙社工教育课程主要有三门。第一门课程主要围绕普通心理学、普通社会学、社会服务方法论和社会服务实践四个学科展开。第二门课程与社会学说有关，主要强调差异与遗传心理学、社会结构、个性化和群体社会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的实践等研究。第三门课程主要包括社会调查技术、社会服务与社区、社会服务的组织与实践等内容。西班牙社工教育高度重视参与社会实践，因此在三门课程中，第三门课程的学习最为重要。

学历体系

西班牙社工教育学历体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本科学历，开设于1983年，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第二个层次是研究生学历，又分

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阶段。其中硕士研究生开设于2004年，代表性的如马德里的康普顿斯大学、纳瓦拉大学和巴伦西亚大学开设的“社区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的管理与评估”和“社会福利：个人、家庭与团体干预”等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开设于2008年，是西班牙社工专业的最高学历，标志着西班牙社工教育水平发展到了更高的层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两个层次学历的学习要求来看，第一个层次的本科学历，学制四年。在本科学习阶段，要想获得社工专业本科学位，必须修满240学分，并且学校十分重视学生的实践讲座、在外实习和国外留学经历。这既是西班牙社工专业学习的主要特点，也是西班牙社会工作教学的重点所在。第二个层次的研究生学历，分为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在硕士学习阶段，要想获得社工专业硕士学位，必须修满120学分，学制两年。硕士研究生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服务的管理与评估、社会福利以及个人家庭和团体咨询等，同时，在结束硕士阶段的学习前，必须完成研究项目的公开答辩。此外，硕士研究生毕业需在国家级研究生学习竞争计划中进行专家评估。在博士学习阶段，要想获得社工专业博士学位，除了学习本专业外知识外，还重视从其他学科中汲取技巧和理论，必须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如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传播学等。

通过这种专业、严格、有序的教育培养过程，西班牙社会工作经历了由一种非专业的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半专业化、专业化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社会工作者不仅获得了社工专业的学位，同时具备了一系列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专业技能。



智利作为地理上世界上最狭长国家，仅有75.6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截至2019年1月总人口1860万，从这两方面来看，智利并不具备突出优势，但在大部分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发展困境的大背景下，智利却在2011年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拉美地区一颗耀眼的明星。197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1020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40年后的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350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2009年规定的高收入国家12196美元的下限标准。2012年又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由此，“智利模式”成为国际社会赋予智利成功经验的最佳赞誉。在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的近10年，智利经济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2018年人均国民收入达15925美元，远超其他拉美国家。智利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回顾智利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40年历程发现，这40年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全面转型的过程。

坚持市场化改革，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

智利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主要表现为推行市场经济、发展多元化对外贸易以及深化资本市场改革。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经济模式由国家主导

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海关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推动海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切实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加强政治机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善抓落实的机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加强政治机关意识教育，把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深化“强基提质工程”，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走好“两个维护”第一方阵。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增强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谋划工作。加强队伍能力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增强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培养更多各方面的行家里手。强化干部队伍纪律作风养成，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令行禁止、担当奉献”的准军事化纪律部队。

增强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运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谋划工作。加强队伍能力建设，强化专业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增强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培养更多各方面的行家里手。强化干部队伍纪律作风养成，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令行禁止、担当奉献”的准军事化纪律部队。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对海关工作的全面领导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

（上接1版）做好进博会监管服务保障工作，支持进境展品常年保税展览展示展销，扩大进博会效应。支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健康发展。促进进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

支持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加大海关监管制度集成创新和复制推广力度，支持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大力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定全岛口岸布局规划，推动尽快实施“零关税”进口商品政策，促进早期收获项目早日落地。实施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分区制度和相关政策措施，大力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战略，优化口岸和海关机构布局，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改革创新，提升开放监管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海关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海关认真落实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部署，以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为牵引，大力推进海关监管模式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以新一轮机构改革为契机，扎实推进关检业务队伍全面深度融合，海关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更加有力，进出口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进入新发展阶段，海关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承担的职责更加繁重，对照中央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海关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精